

传媒 领秀

影响中国传媒的
28位女性

王永亮等◎编著

方沈静 央视主持人
沈冰 央视主持人
柴荣 央视主持人
董颖 凤凰卫视主持人
鲁豫 凤凰卫视主持人
曾子墨 凤凰卫视主持人
樊芸 光明日报高级记者
徐滔 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制片人
王瑶 中国新闻社摄影部主任
刘枫 新疆日报高级编辑
韩小蓓 光明日报高级编辑
熊蕾 新华社特稿社副社长
周玉明 新华社首席记者
张严平 新华社高级记者
向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
胡俊 武汉晚报记者
卢小飞 《中国妇女报》总编辑
赵济清 北京博达新大陆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舒立 《财经》总编辑
金丽红 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
李颖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广宜 《都市快报》总编辑
姚利群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于丹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张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小丫 央视主持人
方静 央视主持人
沈冰 央视主持人
柴荣 央视主持人
董颖 央视主持人
鲁豫 凤凰卫视主持人
曾子墨 凤凰卫视主持人

柔肩担道义
韬略创品牌
论语传神思
声画凝真情

樊芸 光明日报高级记者
徐滔 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制片人
王瑶 中国新闻社摄影部主任
刘枫 新疆日报高级编辑
韩小蓓 光明日报高级编辑
熊蕾 新华社特稿社副社长
周玉明 新华社首席记者
张严平 新华社高级记者
向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
胡俊 武汉晚报记者
卢小飞 《中国妇女报》总编辑
赵济清 北京博达新大陆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舒立 《财经》总编辑
金丽红 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
李颖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广宜 《都市快报》总编辑
姚利群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于丹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张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小丫 央视主持人
方静 央视主持人
沈冰 央视主持人
柴荣 央视主持人
董颖 央视主持人
鲁豫 凤凰卫视主持人
曾子墨 凤凰卫视主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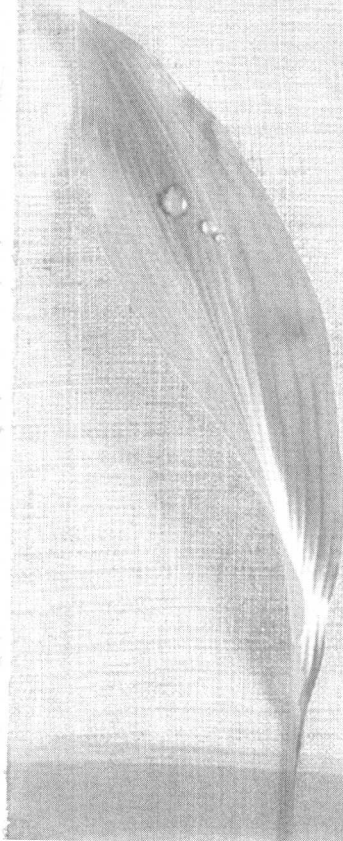
Elite of Media

王永亮等 著

传媒领秀

影响中国传媒的28位女性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媒领秀：影响中国传媒的 28 位女性 / 王永亮等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011-8063-9

I. 传… II. 王… III. 女性—新闻工作者—访谈录—中国—现代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9270 号

传媒领秀——影响中国传媒的 28 位女性

责任编辑：王纪林

装帧设计：肖东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18.5

字 数：376 千字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200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063-9

定 价：36.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312) 2838225

前 言

传媒女性成功“七宗最”

1907年，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鼓动妇女既作女权运动的先锋，又作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士。同年，这位鉴湖女侠就义于绍兴轩亭口，留下千古绝句“秋风秋雨愁煞人”。

1957年，曾被毛泽东誉为“能干的女将”的《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熙修被错划为“右派”，痛别彰善瘅恶、恫罾在抱的新闻界。后人嗟叹：“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

2007年，《传媒领秀》编著出版，书中28位女性既有“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也有传媒高端权威；既有学界精英，也有声屏丽影。掩卷欣然：“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一年来，五十年来，一百年来，由此上溯到两千年来，涵饮于现实历史之间，优游在传媒女性丛中，不仅唱和“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德音孔昭”，更是悟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思想史和新闻史。”

“女性是天生的信息传播者”，由此淬砺出传媒女性成功“七宗最”：重人、至爱、唯美、修德、行善、守诚、贵真。“七宗最”是新闻之本，传媒人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世以人为最

《易经》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圣经》说：“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事，而是来服事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作赎价。”《管子》说：“夫霸业之所始，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性为出发点，实现人的利益，体现人的价值。这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共产主义的特征表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文”谓何物，语言乃其宗；情境臻绝唱，鸟兽岂能工？对传媒来说，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三个境界：

人性境界：对人类价值的追求。骁勇善战的孙膑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

人。”痛定思痛的巴金说：“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传媒所倡导和注重的人文关怀，它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标尺，以大众为中心，表现为个人、群体、自然之间的健康互动、自然和谐，彼此相互理解，从人文的视角来思考中国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文化关怀。“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日记。”传媒致力于打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通道，倡导文化的开放性，立足民族文化，包容世界优秀文化，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努力去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二、情感关怀。狄德罗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能打动人心。”通过对一个个个体、小人物、人性本质的关注和温暖的文字，极力让受众可以获得精神慰藉、尊重和关爱的美好世界；三、成长关怀。西塞罗说：“人民的幸福是最高法律。”传媒提供的经验、思想和情感的信息，弥漫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似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古老的阅历和新鲜的体验都可能与之遭遇。四、社会关怀。传媒始终注重通过文化的传播从而实现对社会的关怀，多年下来，积累、延续成为一股力量，通过传播、接受、认知、作用这样一个过程，最终作用于与个人、社会，成为进步的促进力。“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光明日报高级记者樊云芳有切身感受：“我从死神手里夺得的第二次生命，多么来之不易！每一天都要当节日过，尽量用它再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力所能及的、有价值的事——这才是生命的真谛”、“只拥有事业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亲情、友情是生活的基石，是人性光辉的一面。”我们清晰地听见了樊云芳与死神的黑色对话，看见了她与疾病的苦痛挣扎，看见了一个灵魂对生命的尊重，看见了亲情、友情、毅力、信心、责任——这些温暖我们生命的东西。大苦痛必有大感动，真性情必有真文章。

理性境界：对真理价值的追求。这里的理性实际上是广义的科学精神，所谓“心存明月，不惧天黑。”这种精神可归纳为三个要素：一、好奇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开始于惊疑。其实，新闻也是这样，好奇心是记者探索的原动力；二、头脑的认真。一种认识是否成为真理，一定要追问其根据，判断是否符合经验事实，推理是否合乎逻辑；三、从思想上把握完整的世界图画的渴望。“为生民立心，为天地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了这一步，头脑与灵魂便相通了，新闻与哲学、艺术、宗教便相通了。一位富有人文精神的记者，他会自觉不自觉地从小民生的视角去表达对社会关注，会以平和的心态、平等的意识同对象交流。面对黑暗，会不会难以承受？面对有些死魂灵，会不会失望？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言简意赅：“不会！看得越多越觉得黑暗的深处其实都有光亮，这个世界就是在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向前发展的，认识到这点，就能够保持内心的平衡。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是能看到闪光的东西，那是追求真理价值的力量。”

超越性境界：对生存价值的追求。超越性境界首先体现在一种关怀精神上，它总是与人的某种终极追求相联系的，这种终极追求的召唤，能够让人抛开眼前的利益纠葛，承受住来自于内外界的各种身心压力，用一种类似于宗教一样的虔诚心态

去为自己所信奉的事业追求做出牺牲。记者既有对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又有对社会底层的关怀。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只有芸芸众生的觉醒，才使德先生和赛先生具备实现的条件，“五四”的口号到如今并没有过时，科学和民主仍然是社会前进的方向。顾炎武说，他不敢置四海之穷困不顾而埋首穷经。“要讲民主的话，不要关在屋子里，只读亚里士多德，要多坐地铁和公共汽车。”“韬奋新闻奖”获得者、光明日报高级编辑韩小蕙感触颇深：“我要求自己文章中，力求跳出小我，获得一个大我的人类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己的倾吐表达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只是微尘一粒，毫不足道，他的价值在于：哪怕只拥有一点萤光，也尽可能地去照亮别人！”此言再次诠释：新闻事业是一种境界、一种生活方式乃至一种信仰和终极的托付。

人以爱为最

古往今来，中外先哲无不视爱为社会的灵魂。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讲“王道”，都以爱为核心。费尔巴哈要建立的新哲学也是以爱为基础的，他说：“新哲学建立在爱的真理上，感觉的真理上。在爱中，在一般感觉中——人人都承认新哲学的真理”、“爱是存在的标准——真理和现实的标准，客观上如此，主观上也是如此。没有爱，也就没有真理。”

我们不难看到，真正成功的、对人类进步事业有贡献的传媒都是以“体现人文关怀，关注制度安排”为己任。为之而奋斗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记者毕生的追求！真正有良知的记者应记录真实的中国，并以其人文理想推动中国的文明与进步。从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首开“文人论政”之风算起，到1948年12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这一传统至少绵延了75年。期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也都多多少少培育了“文人论政”和自由思想的种子。“文人论政”就宏观而言并无固定模式，但具体到《大公报》则有其主观规定，那就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他们可能会创造出与他们所负载的使命相匹配的巨大的价值，但他们自己几乎注定要度过清贫甚至多舛的一生；他们多在为理想而拼搏，并未奢求个人能从中获取多少功利。如果说他们有奢望的话，也只是奢望与民众一起分享文明与进步的喜悦，正如卢梭的思想催生了法国大革命，他却只能在天国享受革命的贡果。

因此，传媒和传媒人之爱，应当是深沉的、博大的，映照、温暖着整个世界和人类。就像《圣经》所说，因为已被祭奠，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了。

第一、无私忘我之爱。政治家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忘我”者，才能像一滴水溶化在大海里一样，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无私奉献之难点在于“无私”二字。正如布莱希特所说：“无私，稀有的道德，因为从它身上是无利可图的。”“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新疆日报高级记者刘枫柔肠百结，却又不乏侠肝义胆，常常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她的目光总是投向社会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坚持原则、敢讲真话。有一次，她充分发挥党报舆论监督的作用，将罪犯殷学新送上了断头台。据当时在场的人说，罪犯在被押赴刑场时还叫嚣：“那个戴眼镜、长头发的女记者，你等着瞧！我在阴曹地府也要拽你下来！”刘枫听了后，不以为然地说：我等着呢，自古都是正压邪，看谁能斗过谁！事实上，一个优秀的新闻人的真正价值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种“挑战—应战”的社会状态，揭示这一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意识，深刻地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其成果。其实这也是一切试图成为主流传媒的所应追求的境界。

第二、物我合一之爱。王国维说：“一切写景皆是写情。”与此相映衬的是“一切写作都是写我。”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物我合一是心理发展的最高境界，任何人不论在哪方面的修养能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那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这里的物，既可以指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也可以单指某一方面的事物。“我”指的是人的主观世界。影响“物我合一”的主要因素是人认知不足或人的个人的主观需要，如名利等。由王国维阐发的“一切写景皆是写情”，可以推论：一切写作都是情景合一、物我合一。与“韬奋新闻奖”获得者、中国妇女报总编辑卢小飞交谈中，一个词始终在记者脑中盘旋——“物我合一”。凭借这种物我合一，她先后两次进藏，在高原工作了11年；凭借这种物我合一，她冲破重重阻力，采访到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凭借这种物我合一，她努力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凸现报纸的特色，使中国妇女报在进入WTO时代后的激烈竞争中以创新取胜。

第三、天人合一之爱。学者别林斯基说：“爱的心灵是智慧的思维，爱自身在实际的幸福方面播撒着它所表现的力量。”爱是自我完善，也是帮助他人完善。“情爱其中，大爱其外。”传媒女性对人类怀有一种很深的认同、同情和爱的感情。天人合一的现代价值就在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正因为如此，她们具有帮助人类的真诚愿望，就好像她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身怀天人合一之爱，记者的荣誉就在于深刻地关注和记录人类社会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不断地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所在，深刻地反映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弊端，从而以新闻的力量推进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应该仰望，高深地隐藏多少奥秘，其实这个世界真正的真理永远是朴素的，如太阳东升西落，如春耕秋收，论语告诉大家的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真正的道理是告诉别人怎么才能过上心灵所需要的快乐生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百家讲坛》中的第一句话就以绝对的高

度，一锤击碎了几千年人们对经典膜拜的梦想。

爱以美为最

何谓美？赫拉克利特说：“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庄子则认为：“朴素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在传媒界，有一种美属于北京博达新大陆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济清创办的《瑞丽》：她表现这个品牌是因为对女性特有的最真诚的关爱，传承丰富的文化积淀，融合自由卓越的现代精神，她更加懂得女性的美丽、善良、智慧和伟大。用这种方式，帮助女性追求美、实现美，愿意陪伴着她们人生路上的每一个阶段，奉上她的支持。也有一种美属于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计算机报社社长李颖：当有人要把她和杨澜、李亦非、吴小莉并称为“电视界的女强人”时，她说：“如果是传统意义上的女强人，还是不当的好。”她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个有人格的正直的人，其次，她是一个女人，要做作为一个人应该做的一切，享受作为一个女人应该享受的全部。”可见，美是一种温度，隐藏在每一盏台灯下，蕴涵在每一束阳光中，浸润在每一缕和风里。

对新闻事业而言，如果说“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忧心为政，真情为文”、“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息”是微观之美，那么，宏观之美需要条分缕析：

一、传媒品质要履行四重责任之美。首先，传媒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担当稳压器责任。传媒要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和谐社会的逐步完善。其次，传媒要切实加强舆论监督，担当构建和谐社会的预警器责任。让人们在自由平等的交流中达到意见的一致，是传媒公共领域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人民群众表达权，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表现。再次，传媒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担当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责任。在道德评价这个问题上，和“公民”、“党员”这两种身份相比，记者的“新闻工作者”这个身份是第三位的，不讲公德、没有起码的政治觉悟，职业道德也无从说起。最后，传媒要有效运用对外传播，担当构建和谐社会的扬声器责任。“外知世界”就要了解世界的进展、文化和理解方式。“内知国情”就是要知道我国的实际情况。融入世界的主流传媒，高扬我国传媒的强势之声应该成为所有华语传媒共同的追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利群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主持人，借助这个国际平台和学术桥梁，她致力于拓展“媒介与女性”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实践，推动媒介对性别平等理念的传播，促进女性自身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逐渐成为媒介与女性研究的集大成者、媒介与女性教育理念的先行者、媒介与女性理论的身体力行者、媒体社会性别意识的守望者。

二、记者品行要具备五种能力之美。一是高度敏感的观察力，能及时认知社会的、时代的、国家的、国际的变化；二是要有深刻的洞察分析思辨力，目如锥利方透隙，能够从复杂混乱的社会现象表征中找到事情的本质；三是要有社会活动能力，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能力、公关能力，能够和各行各业的采访对象最快地融合、沟通；四是要有文字表达能力，快而准确地表达采访内容。做记者节奏要快，采访完了就成文发稿，要造就“传媒奥运会”上的“抢道意识”和“冲线意识”；五是要有知识拓展能力，三教九流、天文地理都能知晓，而且能够触类旁通，最大限度地延伸到文章中去，增加文章的厚重感。总之，一句话：文章得失，仰天俯地，寸心自知；思接千载，精骛八极，自然最好。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在做“财富全球论坛”的报道时，曾经创造过在3天里成功采访8位世界顶尖企业、财团主席的记录，因此获得了“年度最佳财经类节目主持人”的大奖。因为子墨，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财经新闻；也是因为她，枯燥的数字、拗口的理论和云里雾里的经济动态开始变得人性化、有趣，甚至温柔起来。很多人说凤凰已经经过吴小莉时代和陈鲁豫时代，正在进入曾子墨时代。

三、文章品位要递升六级层次之美。第一级层次给人以刺激，第二级层次给人以休闲，第三级层次给人以信息。“明星取代了模范，古代排挤了现实，绯闻顶替了事实，血腥覆盖了人性，低俗压倒了端庄”，有受众如此描述时下中国一些传媒的风格，这也是文章品位前三级之美的真实写照。第四级层次给人以知识，第五级层次给人以思想，第六级层次给人以美感。文章品位后三级之美应该不辞辛劳地去追寻。“没有不朽的物质，只有不朽的思想”，讲可读性不可不讲思想性，讲趣味不可不讲品位。有思想性的可读性、有品位的趣味，才是真正为读者所喜爱的可读性和趣味。“文章辉五色，心迹喜双清”、“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达到词义“双美”，应该是我们新闻写作要追求的目标之一。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文章家大都是最高的两级层次，也就是拨动了时代发展最紧的那根弦，发出历史的最强音。造就一篇好文章，绝不仅仅是靠漂亮的文字、敏锐的嗅觉和技巧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一篇有思想深度和美学价值的文章，在不同层次的受众那里会不同的理解和触动。对某些受众，即使他对文章的某些要素一时理解不了，但只要你的文章是好东西，他还是能感受到的。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高级记者张严平切中肯綮：我追求完美的表达方式，有时我会因为一句话的表达不能让自己满意，而一整天都写不下去。我总觉得，要描述一个人，叙述一件事或表达一种情感，世界上一定有最恰切的方式能够来表达。我力求文字朴实，有诗意，蕴美感，干净而内敛。“十分”意味，“八分”表达，剩下的“两分”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美以德为最

德，人之本，政之根，国之基。“德者，得也。”辛弃疾有词曰：“道德文章传几世，到君合上三台位。”从《论语》、《史记》到唐诗宋词，从《新青年》、《大公报》、《新华日报》到《中国的西北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东方风来满眼春》，千百年来，这些道德文章深刻影响了千百万人，有力地推动了历史进程。

蓄道德而能文章。薪尽火传，历久弥新。这 28 位传媒女性当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无愧于道德文章的张扬者，或是对传媒某些旧观念的廓清，或是向传媒实践新领域的漫溯，或是给传媒主管机构献策的论证，或是传媒人跳出传媒看全局的超拔。听其言，观其行，悟其道，我们愈加叹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说：“有境界者，则自有名句，自成高格。”

首先，以德修身。人无德不可立于世，德乃修身之首。重视道德践履，强调道德修养、修心炼己是治理人心和德治社会的前提。古人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西方学者也有“感情移入”一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卿似乎也深知人有一颗平常心的重要。有了这颗平常心，她化蚕成蝶，对自我的掌控更加游刃有余：被评为“第三届上海十大文化新人”、“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荣获首届“年度中国电视主持人颁奖晚会”最佳电视女主持人、最佳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2001 年度金话筒奖、2006 年度金话筒奖。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的风格曾经被认为充满促膝长谈式的温情，缺少尖锐的一面。对这样的评论，她不以为然：“没有必要为了尖锐而尖锐。其实要想尖锐是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说狠话就可以了，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就可以了。这个并不难。但我个人不喜欢这种所谓的尖锐的风格，因为我把你请来不是要让你难堪的，那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我为人的原则。把别人请来，就要负起保护的责任。”

其次，以德化人。德具有感化他人，陶冶情操之效。德国诗人歌德曾言：“只有对自己所表现的东西也怀着深情的时候，你才能淋漓尽致地去表现它。”“德”的弘扬，关键在为政者，正人先正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向菲用声音教化了三名在逃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随后又有了第四个，2006 年 2 月 28 日，犯罪嫌疑人案发 7 天后找到她。在他去自首的途中，她一直用短信陪他聊天。7 天的时间，她给他发了 200 多条短信……他们怎么会向从未谋面的她敞开心扉？他们怎么会仅凭着那个电波里传来的声音就放弃了逃亡？她坦言：“当你有一种责任感的时候，你就不会远离听众。”最早做节目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越在乎大家有没有看到她咄咄逼人、出口成章的能力。后来她意识到主持人别混淆了自己的身份：主持人都太过强势，压抑了嘉宾的光芒。她一语中的：“要知道，嘉宾才是主角，

主持人的作用是保护嘉宾，让他打开自己，最真实地袒露自己，节目才好看。”

再次，以德执政。《道德经》说：“德成于中，礼行于外。”孟子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这样，孟子便由个体自身的道德修养进而推己及人，由个体扩充到国家，由德育最终实行德治。领导干部为人处世注意保持博大胸怀，宽容一点，谅解一点，豁达一点，糊涂一点，要能够听得进、容得下、想得开。对此，我们想起160年前马克思曾告诫掌管意识形态大权的官员：“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记者和官员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他们的社会分工不同，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也大不相同。官员的职能在管理，主要在“做”，说出真理不是他的职责。记者的职责就是“说”，说出事实真相，说出群众想说而没有说或不敢说的话，要说出令人茅塞顿开的话，要说出使人义愤填膺的话。“说”就是舆论对权力的一种制衡。说真话难免会得罪人，既然选定了当记者，就堵死了做官的路。《财经》杂志是一个多维、立体、不回避问题的刊物，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框架，虽然做的很多报道是批评性的，但是它并没有起到破坏中国形象的作用，相反，使得国外读者认为中国的传媒正在发挥监督作用。事实上也是这样。《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报道过《财经》，这恰恰说明了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政府追求一个透明化的市场环境，追求一个平衡的经济发展环境。该杂志总编辑胡舒立一语中的：“外宣的努力既是外宣媒体应该做的，也是我们这些综合性传媒必然会去寻求的。也可以有一些互动、合作。”诚哉斯言！社会需要正直的官员，更需要仗义执言的记者，他们从不同角度推动社会进步，他们的良性互动是社会的大幸。

最后，以德弘法。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道德与法律既有一致之处，也有很大差异：法律的效力等级高于道德，法律和主流道德在内容上基本是一致的，越是在民主的法治社会，法律就越是合乎道德、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宪法是道德之母。”我国《宪法》第27、35、41、47、条充分保障了传媒的职业道德，即新闻自由的权利。新闻自由是个法律概念，是指传媒在法律范围内报道新闻、发表意见的自由，对新闻自由主要依据法律加以限制，超越法律的限制就是对自由的压制。马克思说：“没有新闻自由，其他的一切自由只能是虚幻。”恩格斯也说：“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公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根据宪法条文和其他规定，我们可以为新闻自由的发展树立以下目标：一是传媒可以评论执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二是传媒可以评论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施政活动；三是传媒可以独立负责地揭露和批评贪污、贿赂和徇私枉法。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姚广宜语意深邃：通过对司法的监督，可以提高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减少司法腐败的机会，使审判真正成为了“阳光下的作业”。在明确司法监督的范围的前提下，法制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循依法行使

监督权利的原则。“依法”是为了保证舆论监督的公平、公正，真正达到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的目的。

德以善为最

在德中，以善心善行为本。“善”，是德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德为善政，政在养民”，这是《尚书》里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论语》里的话，都是讲“善”。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近于道。”译成白话是：最高的善像水一样。水润泽万物，令它们繁盛地生长，而它却从不与万物竞高下，争长短，它总是安身立命在众人所不愿去的低洼地，这种品格才最接近于道啊。

我们今天强调“善”，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团结互助、讲信修睦；就是提倡每个人要为他人、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树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就是鼓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传媒作为一种资源、一种社会力量，跟水性是非常接近的。它无所不在，在现代社会当中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传媒人力资源管理视野下人才开发的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层次：第一分层是传统的专业型传媒人才；第二分层是职能类管理人才；第三分层是职业经理人才。这三种分层之大善升华为三种意识：

一、专业型传媒人才要有问题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现代传媒对专业型人员的要求与从前有所不同，这些不同之处也正是传媒人才培养的重点：（一）传媒人才的人格要求。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荣誉在于深刻地关注和记录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成果才能有效地融入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力量潮流中去。（二）传媒人才的专业自觉。谁对于资讯的分析整合能力强，谁就拥有更多的社会“话语权”及传媒影响力。（三）传媒人才的基本风格。专业的视角、专业的分析工具与方法，将帮助受众更加真切地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作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给人温柔、关怀和贴近的亲切感，而方静却更显示出新闻的中性和冷静。镜头前，她从无大悲大喜的表情，因为她觉得新闻需要的不是“会煽情的人”，而是一个不从个人好恶出发，多做客观评价和思考的，表现得更为冷静理智的主持人。丰富的阅历和社会学的背景使方静具有了同龄女性所少有的思辨色彩和绝不浮躁且极具知性的言行。她认为新闻类型的主持人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是好奇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谈到作为主持人，她是否是一个对时事有独到见解的人，方静说：“独到谈不上，但是我痛恨人云亦云，痛恨盲目跟风，凡事总要问个究竟。”

二、职能类管理人才要具备品牌意识。在传媒品牌建设中，没有优秀的人才比

没有资金更可怕，一定要把人才发展战略置于优先考虑的重点，切实搞好品牌发展战略与人才战略的有机结合及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人才创造性和能动性潜力的开发，又是促成品牌成功运营的强大武器。的确，在眼前这个喧闹、多元、文化断裂的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身影是人们的共同感受。在中国的传媒领域，人们对固化的理想模式与现实效果之间的断裂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大量的节目产品几乎是千篇一律地克隆。凤凰卫视恰巧诞生在需要文化重构和创新的年代，在努力寻找如何亮出自己品牌的时候，喊出了“开拓新视野、创造新文化”的口号，亮出了自己的旗帜。通过三个“依靠”，达到三种“融合”，实现三个“改变”。即：依靠有选择地对西方和港台文化的汲取、借鉴、消化；依靠对前沿意识的把握和领悟；依靠群体智能优势和富有成效的运作机制，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把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相融合，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相融合。使电视文化高高在上的尊严性变为平民化、低视角；使严肃刻板的教化功能变为宽容、理解、沟通；使自视高贵的精英文化变为直接的心理体验，从而找到了雅俗并存、中西融会的文化定位。央视市场研究股份公司2006年5月公布的最新数据：在杭州市所有媒体中，《都市快报》的年到达率、月到达率、周到达率、日到达率和平均每期阅读率均位居第一。这表明该报的市场定位和办报理念，得到了杭州市民最广泛的认同。“品牌”是《都市快报》总编辑杨星常常放在嘴边的另一个词语。用她的话说，“品牌是没有止境并且也是不能停止的，只有根据社会的发展、需求的变化随时进行创新，才能永远保持领先”。

三、职业经理人才要具备通才意识。职业经理人即传媒业务经理人，传媒管理者的高层代表，包括电影、电视、广播节目制片人、报业传播业务项目经理、出版界项目负责人等。这类人才与职能人员、专业人员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综合性，突出的职业特征是能够融媒体传播与经营管理的知识和能力为一体，是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从核心竞争力来说，传媒职业经理人是熟知中国传媒国情，懂得运用经营管理和新闻业务知识、经验及技能，以传媒经营管理为职业的人。其应该具有三种能力：把握体制和政策的能力，有政治头脑和制度意识；熟悉新闻业务的能力，掌握编辑和采编等基本新闻业务知识；企业经营管理的的能力，懂得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财务学等基本经管知识。时至今日，随着传媒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快和国内外传媒竞争的日益加剧，传媒经营管理型人才逐渐受到重视。凤凰卫视主持人间丘露薇阐释精到：“记者、主持人、管理层，我不知道喜欢哪个身份更多一点。现在跑一线不像以前那么多了，除了一些重大题材，感觉上更轻松。每天的工作里有比较大的一部分，是在开会，每天到台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会，讨论当天的头条。其实我很讨厌开会，特别是不能形成任何决议的会议。但是作为管理层，思维方式跟记者单枪匹马地冲在一线是不一样的，当记者，只要想着自己这一条片子这一个事件如何表现到最好，而且直接可以看到成果。在管理层则需要有全盘考虑，有策划意识。”

善以诚为最

《中庸》云：“诚即真实无妄。”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明清之际王夫之有时把“诚”直接解释为“实有”，用以说明物质世界的实在性，说：“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诚信自古就是核心道德之一，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新闻事业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美国新闻界巨擘普利策在一篇名为《新闻学院》的文章中曾大力提倡新闻学教育：“一家有能力的、无私的、为公共福祉而不懈奋斗的报纸，与训练有素、了解并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共同努力，可以脱离虚伪可笑的政府而独立保护公共美德。一家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人心的报纸也会适时地造就以它为基准的民族。铸就未来共和国的力量就掌握在未来一代的记者手中。”

游刃于“经济半小时”和“开心辞典”两档风格完全不同的节目之间，并且拥有如此高的人气，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丫靠的是什？她说：“这两个节目都属于传媒性质。传媒的基础是沟通，沟通的基础是诚恳。这两个不同的节目，我用诚恳来统一。”在对待作者的时候，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金丽红从来都是以诚相待，在她心中，读者第一、作者第二、书店第三，第四位才是自己。传媒文化的职业要求是客观、公正、平衡的报道方式和实事求是、通情达理的评论方法。这是传媒的报道和评论获得公信力的有效途径，采用新闻专业主义的方式方法有利于传媒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我们亟须用先进的传媒文化确保传媒诚信度，应该从以下“三观”着手：

一、崇尚受众观。中国的传媒同英国 BBC 一样属于国家所有，不同的是，BBC 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存在的同时，具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政治体系保持着一定的张力，而中国的传媒是隶属于政治体系的新闻宣传部门，社会效益和政治责任优先于经济效益，其诚信度除了客观、公正的报道外，还来源于政治体系所赋予的特殊职能。马克思指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在担当党和政府“喉舌”的同时，又是人民的“喉舌”，既与政治体系具有极高的一致性，又要监督前者的运行。这种双重角色具有同质性，因为在中国，执政党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宗旨，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在理论上是一致的。“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徐滔结合收视人群的特点，把节目定位在民生新闻上，也就是把贴近性、服务性贯彻到每条新闻、每个节目中，什么题材的节目都以百姓生活为切入点。事实证明，这样的节目定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感觉，绝不能把民生新闻看做一种技巧，民生新闻应该是一种姿态，一种放下媒体高高在上的架子，真正和老百姓心贴心的姿态。

二、强化自律观。新闻自律是新闻事业高度发达普及、实现大众化传播并与社会各领域发生更密切关系之后的必然产物。新闻自律应当是新闻界必须一直坚持的准则，而并非是对高度发达的新闻界的要求。美国在媒体自律方面有不少经验：第一，早在1923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就颁布了“新闻法规”，比较全面地界定了媒体自律的基本要素，包含了责任、自由、独立、真实、公正等准则。第二，在美国新闻界有来自于行业外的监督组织：一个名为“媒介研究中心”的机构自1987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把抵制自由主义偏见的政治平衡带入国家的新闻媒体中，还有来自于专业组织的批评，专业组织坚持认为，新闻工作者在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力方面面临问题时应提高自身的技能并勇于面对法律的挑战。第三，对美国新闻界自身而言，它最大的职业特色就是奉行陈述事实与发表意见分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实行新闻报道部门与新闻评论部门分立，文体和版面分离。第四，美国成熟的媒体在业务上的标志，普遍表现在日常操作程序中的规范性实用文本上。美国的报业自律之所以起到了规范传媒的作用，跟美国新闻界的自觉意识自然分不开。实际上，我国缺少的不是一个自律的准则，而是对准则有效的执行机制。作为靠说话吃饭的传媒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沈冰探幽析微：“责任”的第一要义就是不要人云亦云，首先要说真实的话，其次要说合情合理的话，最后要说言之有物的话。中国不是一个有着宗教传统的国家，大家的共同信念从哪里来？社会的“蔚然成风”从哪里来？传媒人需要担当重任，在这责任背后体现着价值观、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三、摒弃低俗观。近一段时间，低俗之风在一些报刊、图书、广电、网络中呈抬头之势，传媒在追求“眼球效应”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忘记了自己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新闻工作者在治理新闻低俗化中具有重要责任。一方面，新闻工作者应该用过硬的品质修养和良好的行动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绝不能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迎合低级媚俗之风的借口与盾牌，让糜烂的精神垃圾腐蚀大众的灵魂，污染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必须科学界定“低俗”概念，旗帜鲜明地划清“低俗”与大众文化、与“三贴近”的界限；必须建立有政府主管部门、传媒、行业协会以及受众代表参加的传媒道德监控机构，构建评估传媒低俗与否的评价指标体系；必须促进监管手段的法制化、科学化和可操作化，将党的领导和政府监管、传媒自律、行业规范、社会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遏制传媒低俗化的网络式的制约机制。“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新闻社摄影部主任王瑶在1992年参加“桂林空难”报道，以照片《悼亡灵》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谈及往事，王瑶说：“照片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拍摄者的心态。记得当年我在桂林拍摄空难时，也有大批‘狗仔’在现场等待抢拍独家新闻，但他们的‘独家’却是肆无忌惮地表现空难家属痛哭的表情，而且还是在说说笑笑中拍摄的，这对于我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职业要求’！”“当时，我也在拍摄这些悲痛的人们，只记得泪水始终模糊了我的眼睛。记得摄影大师卡帕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站得不够近。在我看来，他说的‘近’绝对不是你拿

着相机和被拍摄者贴得越近越好，而是你与他，是人与人心的距离，忙于拍摄的‘狗仔们’为什么不把自己和拍摄对象换位想象一下呢？”

诚以真为最

“真”是诚之精髓。大真无言，大真为美。古人治史，讲究“良史要以实录直书为贵”，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出”。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齐太史”、“董狐”等也被孔子赞为“古之良史”。这种“良史精神”对今天的传媒人来说不无具有深入反省和践行的现实意义。

“谁谓河大，一苇杭之。”当 SARS 逞凶肆虐神州之时，真相何在？当陈良宇、郑筱萸、邱晓华、杜世成之流违法乱纪之时，真相何在？当山西黑砖窑奴工血泪纷飞之时，真相何在？真相中有着社会病态的全部 DNA，真相攸关每个人的生命权利，攸关社会的集体福祉。对真相的拷问和追索理所当然地高于一切，高于所有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高于所有的官场潜规则。没有真相，公正就是一种奢侈品。而没有公正，则一切失去了意义。惨重的教训证明，公民监督的紫丁香凋谢，官员作恶的罂粟花就必然盛开。这也引人深思：如何才能达到“良史精神”的标准呢？说到底，是做人的问题，做人就要坚持真理——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坚信有秉承社会良知、展示思想力量的天职；让世界增一份理性，多一声正气，能对人有所启发。一句话：写真事，说真话，讲真理；传民情，达民意，呼民声。

提倡史学家的求真精神，就要做到新闻真实。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传媒有天然的使命，要及时准确地为受众证实和核查那些芜杂的信息。记者首要的品格就是要有正义感，能够代表社会的良知与百姓的心声。这样的记者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正义在身，不管你官居几品也没他大，休想以权势压住他的声音。这种强大首先来自于记者的信仰，而“真”应该成为所有记者的第一信仰，它超越种族、国体、政体、主义，乃至时代。文汇报首席记者周玉明是有信仰的，她的激情和正义感都源于她那简单而平实的信仰。8年前她写过一篇“记者手记”，题目就叫《我信仰真》。文中总结了自己当时已然从事33年新闻工作的体验，认为新闻职业的神圣信仰就是“真”。她“立誓做个说真话的、说老百姓心里话的记者”，“我相信说真话永远有知音”。她认为：“激情只有在说真话上才是没有白用。”而且她从不吝啬激情，因为她相信“激情如力气，越用越会长”。

提倡史学家的求真精神，就要做到言论客观。邹韬奋这样说：“我们以为无论

做人做事，宜动些脑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从，有自动的精神，有创作的意愿，总能有所树立，个人和社会才有进步的可能。”在意识形态、法律体系、社会规范日趋和畅的环境下，传媒应当在言论立场上追求客观的原则，去魅、去偏见、去谎言，透过表层看到内里，使受众对许多事物不再感觉那么陌生，以及因陌生而神圣化、妖魔化。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有人命关天，有财产万千，有毁誉忠奸，因此要“一无所求，二无所惧，自立于天地之间。”无所求，就是不求谁给一顶乌纱帽；无所惧，就是行为检点一些，不怕别人抓辫子，有了这两点，才能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高级编辑熊蕾言辞犀利：总体上说，西方媒体的宣传意图比较隐蔽，报道手法看上去比较客观，因而对受众产生很大的潜移默化的效果。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新闻报道的调子总是硬邦邦的，宣传的意味特别浓厚，贯彻领导意图的用心非常明显，不像美国媒体那样非常隐蔽。我们的媒体没有太在意公信力，他们有强势的灌输的意图，而且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造成的影响是，即使报道的事实是真的，是真理，依然达不到我们想要达到的宣传效果，因为人家不接受。

提倡史学家的求真精神，就要做到效果平衡。早在230年前，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就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今天，传媒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加速转型期，如何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理论上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麦考姆斯与肖提出的“议程设置”假说和1973年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内尔—纽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学说，逐渐印证了现实中存在着话语霸权和话语歧视的现象——传媒唯利益集团马首是瞻，弱势群体淡出传媒视野……武汉晚报《胡俊视点》对记者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必须有质疑的精神，有平衡的意识，有高超的现场调查能力，要让沉默者说话，为无言者立言。该栏目主持人胡俊有感而发：起初，我们的口号是“不一样的新闻视点”，关注的是南湖花园隧道让十万人绕道走这样单个事件批评报道；后来，我们提出“注重理性和建设性”，聚焦于四座收费桥困住黄陂县城这样的热点反思文章；最后，我们追求“做有影响力的新闻”，推出了3000小考生妖魔化妈妈这样立体轰炸性的系列报道，希望新闻能让尽可能多的人有所得，有所思。

王永亮

2007年7月16日于中国政法大学砥悟室